

中国全史

主编 张岱年 李养森 主编 史学文明编辑部

# 新编中国思想史

下册

人民出版社

PDG

## 本卷提要

本书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介绍了明代初期、中期及后期理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明代初期，在官方朱学确立的同时，还有薛瑄和吴与弼所坚持的作为文化理想的朱学。薛瑄的思想为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气学思想的发端；而吴与弼则开启了明代中期心学思想的端倪。明代中期，王守仁心学思想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它所倡导的人的主体精神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学后学各派中的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宗旨，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明朝后期的东林学派和两大儒师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批评王学末流的同时亦抨击时弊。他们是以后启蒙思潮的先驱。

本书在描述思想脉络的同时，还介绍了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一幅纵横相交的思想画面。

# 百卷本《中国全史》 编辑工作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名誉主编：张岱年 季羨林  
总策划：胡晓林  
主编：史仲文 胡晓林  
主任：王书良

## 专家团队：

马学良	柯敬	王相	钦吉	王梓	坤渭	王钟	翰生	伏春	霖和
宁可	吕齐	吕大	大一	宋大	渭鉴	朱德	生辛	刘乃	勤年
刘重	吕世	汤启	介功	年仲	玺华	杨显	清源	李岱	良翔
何兹	齐蜀	林启	志浩	张传	文正	张罗	安名	周徐	一迺
陈高	宋林	林哈	经久	林钟	路志	罗贺	逸		
季羨	林彪	董董	董董						
黄烈	龚书	铎铎							

## 编委：

丁双	平渭	马洪	路文	王宇	信生	毛佩	琦英	石椿	年氏	成常	福富
朱大	践平	刘士	文健	刘秀	彬毅	李尚	占泽	杨武	金建	佟德	斌翔
张岳	庆平	张周	湘斌	张彪	毅志	张金	泽吾	武顾	建华	岳徐	迺迺
梁满	仓	谢宝	成	颜品		颜吾					

## 百卷本《中国全史》各断代分卷主编

远古	暨三代	马洪	路文	张才	彬毅	成常	福富
春秋	战国	王宇	信志	杨生	民平	岳吾	斌翔
秦	汉	颜品	忠	岳庆	平	颜吾	斌翔
魏	晋南北朝	朱大	渭成	梁满	仓		
隋	唐五代	谢保	成	武金	铭斌	刘士	文健
宋	辽夏	张德	富	周湘	建	张	
元	明	佟德	琦	顾全	泽	何长	华英
明清	民国	毛佩	生	鹿	毅	李尚	
		刘徐	迺	张占	占		

## 本卷提要

本书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介绍了明代初期、中期及后期理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明代初期，在官方朱学确立的同时，还有薛瑄和吴与弼所坚持的作为文化理想的朱学。薛瑄的思想为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气学思想的发端；而吴与弼则开启了明代中期心学思想的端倪。明代中期，王守仁心学思想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它所倡导的人的主体精神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学后学各派中的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宗旨，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明朝后期的东林学派和两大儒师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批评王学末流的同时亦抨击时弊。他们是以后启蒙思潮的先驱。

本书在描述思想脉络的同时，还介绍了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一幅纵横相交的思想画面。

## 目 录

## 中国明代思想史

<b>一、明代思想概述</b>	1
<b>二、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b>	5
(一)三部《大全》的纂修	6
(二)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2
(三)明初朱学主要人物的理学思想	16
1. 薛瑄的理学思想	17
2. 吴与弼的理学思想	26
<b>三、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的转变</b>	34
(一)陈献章的心学思想	34
1.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本体论	37
2. “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	42
(二)湛若水对江门心学的发展	45
1. “天地古今，同此一心”的世界观	46
2. “体认于心”的心学方法	53
<b>四、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b>	59
(一)王守仁的生平活动及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59
(二)“心即理”的心本体论思想	65
(三)“致良知”的哲学核心	74
(四)“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论	84

(五)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分化	91
<b>五、王艮与泰州学派</b>	95
(一)王艮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	95
(二)王艮和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	101
(三)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	110
<b>六、泰州后学几位重要人物的思想</b>	114
(一)李贽的异端思想	114
(二)何心隐的社会思想	118
(三)罗汝芳的人性思想	122
<b>七、明代中期理学向气学的转变</b>	129
(一)罗钦顺及其气学思想	130
1. 罗钦顺的生平及其思想形成过程	130
2. 罗钦顺的气学思想	134
(二)王廷相及其反理学思想	146
1. 王廷相的生平及其著作	146
2. 王廷相的反理学思想	148
<b>八、东林学派的主要人物及其理学思想</b>	163
(一)顾宪成及其理学思想	163
1. 顾宪成的生平及其理学派别	163
2. 对程、朱理本体论的重扬	167
(二)高攀龙及其理学思想	171
1. 高攀龙的生平及其学术渊源	172
2.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175
<b>九、明末两大儒学家的思想</b>	181
(一)刘宗周及其思想	181
1. 刘宗周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	181
2. 刘宗周的思想理论	183

(二)黄道周及其思想	191
1.黄道周的生平	191
2.黄道周的理学思想	193
<b>十、结    语</b>	199

## 一、明代思想概述

明代思想史是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又是一部哲学思想发展史。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里谈到哲学史的含义时这样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sup>①</sup>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有优秀文化历史的民族,他们的哲学家所从事的思想活动都是在竭力地“深入上帝的本质”,尽管哲学家们接近上帝的路途不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兼思想家的人物说过,在最高的层次上,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相通的。这就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无论是东路还是西路,南路还是北路,人们最终是可以相会在峰顶的。然而,人们毕竟要经过特定的登山途径才能站在峰顶领略无限风光。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的“理性思维的英雄们”是沿着什么途径深入“上帝的本质”,登上人类精神的最高点的。

与希腊、印度两大文化区不同,中国大文化区内的哲学家们是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7页。



以构筑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来深入“上帝的本质”的。这种理想包括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两个层面。它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思维路线,以“内圣外王”为行为实践方式,最后交汇在“道”的最高范畴上。金岳霖先生称“道”为中国大文化区的“中坚思想”。中国哲学也可称为“道”学,中国哲学思想史实际上就是“道”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至北宋时,“道”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新的内涵,被解释为“理”。围绕着“理”而进行思想活动的人们称为理学家。尽管“道”的外在形态变了,然而它的精神血脉却仍深潜在中国哲学的思想流程中。“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走向后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它原本是要张扬一种大同、和谐、亲情、友情的文化理想,通过哲学的思考给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价值参照和世界观的指导原则。由于它的实践取向不是立足于超越而是立足于参与,也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理想,加之它的主要内容是为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而设计的,因此,它又与现存的社会模式乃至政权力量有了相当的亲和性。至明代初期,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帝国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便被统治者拉入政治的庙堂,成为官方哲学。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思想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由胡广等人编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三部《大全》的出现,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独尊地位的确立。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模糊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和被政权异化的理学之间的分野,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明代初期,尽管有官方倡导和支持的理学,然而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仍没有消失。薛瑄学宗程朱,开山西“河东之学”,门徒

遍及山西、河南、河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大宗。他的河东学派以“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为思想宗旨，主张“道器不离”，“性气相即”的观点。在心性修养方法上，提出“气中求性”的思想。薛瑄的思想开启了明代理学“气论”一系的端绪。

与薛瑄几乎同时代的吴与弼，也是朱学大宗。他在南方创“崇仁之学”，与北方的“河东之学”遥相呼应。然而，与薛瑄不同，吴与弼“兼采朱陆之长”，“寻向上工夫”，强调“静中体验”、“静中思绎”的“静观”。他的学生陈白沙和娄谅发展了他的思想，流行为明朝中期王守仁心学的“发端”和“启明”。

明代中期，朱学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扮演思想史主角的是王守仁的心学。王守仁的思想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形成了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心学的高峰。王守仁心学的中心思想，是所谓“发明本心良知”。它注重人的主体精神的价值，以人的存在和精神质量为参照来确立世界万物的意义，这实质上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确认，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守仁弟子众多，传其学者不能不产生歧异。

王学的后学分了若干派别，浙中有王畿、钱德洪，这一派在上层社会影响甚大；江右王学以邹守益为正传；南中王学有薛应旗，造就不大；此外还有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地域很广，但没有突出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它虽出于王门，但又与王门不同。这派在民众中影响很大，平民色彩极为浓厚。其开创者王艮，倡“淮南格物”之说，提出著名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以“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为自己的社会理想。李贽、何心隐、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有名学者，他们的“异端”思想非常值得重视。

明朝中期，与王守仁心学相对的有罗钦顺、王廷相，他们主张“天地未生，只有元气”的气学思想。他们是明朝初期薛瑄气学思想的延续。

明代后期，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组织社团，讲学著书，评论朝政。在学术思想上，他们批评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在政治生活上，他们直言敢谏，抨击时弊，最后遭到明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宗羲称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sup>①</sup>

刘宗周和黄道周是明末两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创“慎独”之说，讲学于蕺山。明亡，不食而死。黄道周精于《易》学象数，其天文、历算之学，十分深邃。明亡，起兵抗清，兵败被执，以死殉国。在学说思想上，他们都是博学高识之士；在政治生活中，他们刚直不阿，尚气节，重操守，敢于“犯颜谏争”，堪称“万世龟鉴”。<sup>②</sup>

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明末两大儒师，他们对旧理学的批评以及新思想的提出，都可视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sup>①</sup>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

<sup>②</sup> 《明史》本传。

## 二、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

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并未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更没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虽然朱熹生前长期讲学著书，弟子众多，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学派，但由于在他晚年直到死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学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制。有的学生被诬为妖人，遭流放驱逐，客死他乡；有的学生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下，变服易形，以示异于朱门。就是学者应举考试，也要声明自己并非朱学，方能参加。

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学术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然而还没有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此后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朱学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元仁宗皇庆年间，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但实际上朱学仍未受到重视。标志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确立的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修成的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的修成距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将近半个世纪。三部《大全》共计二百六十卷，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

## （一）三部《大全》的纂修

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的开端。《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载：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思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明太祖时，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尚未确立，作为帝王之尊的明太祖也只是以佛、道经典或以杂书为个人的读书书目。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的。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对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解缙此时提出“上接”与“下及”，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大全》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原来为两部，又称“二书”。一部为《五经·四书大全》，一为《性理大全》。前者《五经·四书大全》为圣贤精义要道；后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羽翼六经的著作。“二书”分称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是修成进览时由明成祖确定的。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载：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饩。

《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

《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下叙胡广、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亲序之。临海陈遵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舛悞。虚心观理,自当得之,不可泥也。”

这三部《大全》,开始纂修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后,修成在永乐十三年九月,时间不到一年。开始原想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后被诏催促,乃草草成书,“不暇精择”。可见《大全》修得比较草率。容肇祖先生认为,由胡广等主编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若干宋元以来的陋说,在经学的价值上远比不上唐代的《五经正义》。”<sup>1)</sup>

三部《大全》纂修完后,胡广等进览,明成祖亲自作序,并命礼部刊赐天下。

现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有白棉纸印本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纸质厚实,大于十六开本,估计为当时的礼部印本。另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藏有桑皮纸印本的《性理大全》,

1. 《明代思想史》,第2页。

此为南京的翻印本。这两种印本均为善本，是国家的贵重文物。

明代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元代，朱学虽然被列为科场程式，开始成为官学，但并未获得独尊地位。与宋、元两朝相比，明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为加强，因此，从官方的统治来说，也更需要寻找一种能够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理论思想。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里认为古来的圣王都是“以道治天下的”。这个“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日用之理”。唐、虞、三代由于“道以为治”，所以能够“致雍熙悠久之盛”，秦、汉以后“卒无善治”，这是因为“道之不明不行”，“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可见，明成祖与历朝历代的君主一样，也深知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朱学原本是一种学术思想，但由于它所提倡的社会价值理想是根植于封建宗法社会之中的，因此它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很容易与统治者的思想标准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以朱学为主体编撰的三部《大全》自然就成为明代封建国家的思想准则了。朱棣认为，三部《大全》刊印“颁布天下”以后，天下之人就能够“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此“穷理而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必将有赖于斯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三部《大全》，而“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则是颁行《大全》的宗旨所在。总之，统一的封建国家需要统一的社会思想，三部《大全》的颁布既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了统一的思想准则，又使朱学纳入官学的轨道，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

在明政府的官文书里，三部《大全》的顺序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收集的并非都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朱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着程门弟子、朱

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因此，说三部《大全》确立了朱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是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地位。以《性理大全》为例：在卷首所列的“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程朱理学家占半数以上，著名的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游酢、谢良佐、刘绚、李颢、吕大临、扬时、侯仲良、张绎、尹焞、范祖禹、朱棣、胡安国、陈渊、祁宽、罗从彦、李侗、朱松、刘子翬、朱熹、张栻、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李方子、董铎、廖德明、度正、真德秀、魏了翁、项安世、饶鲁、熊勿轩、黄瑞节、许衡、吴澄、黄潛等多人。另外，《性理大全》的“诸儒”一目，所列者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程子门人、罗从彦、李侗、胡安国（附寅、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子门人、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百分之七、八十为程朱学派中人。

虽然三部《大全》收的多是程朱理学家们的文献，然而，朱熹个人的思想观点却极为鲜明。就《性理大全》而言，其中所收篇章，或为朱熹所注，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朱熹注）、《易通》（朱熹注）、张载的《西铭》（朱熹注）；或为朱熹所作，如《易学启蒙》、《家礼》；或为朱熹门人所作，如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只有《正蒙》和《皇极经世书》既非朱熹所作，亦非朱熹所注，但是这两部书也是朱熹所推崇的。这些著作，都收在《性理大全》的卷一至卷二十五之内。《性理大全》的卷二十六以下至最后一卷，为有关性理的语录，语录的门目，大体仿照《朱子语类》的门目。例如“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等等，与《朱子语类》的门目若合符节，语录的内容也取自程朱及朱熹门人后学之说，很少有其他学派的。

《四书大全》的全名是《四书集注大全》，它更集中体现了朱



熹思想的正统地位。《四书大全》所收诸儒之说以朱熹的思想观点为截取标准。书的《凡例》指出：“《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集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集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由此可见，《四书大全》所辑录的诸儒之说，不论是《集成》、《辑释》所已取的，或《集成》、《辑释》所遗漏的，还是这次新增入的，其作用都在“发明经注”，即发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文的涵义，使之更加明确透彻。而朱熹的原文，保留不动。可以这样说，《四书大全》实际上是朱熹《四书集注》的放大，是一部朱学著作。

《四书大全》包括四个部分：一、《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三、《孟子集注大全》；四、《论语集注大全》。其中《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只是把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孟子集注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了诸儒之说。这是《四书大全》在编辑体例上的一种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中途诏旨迫促，便将《大学》、《中庸》草草完书，未及编采诸儒之说的缘故。

三部《大全》中，《五经大全》的卷帙最多。计《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传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几乎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总数的三分之二。由于诸经分纂，原书卷帙不少，合起之后便十分庞大。《五经大全》所据经注，均属朱学著作。例如《周易大全》采用《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依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主胡安国《春秋